

評林毓生著

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代的反傳統主義

丸山松幸 著

高明士 節譯

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xiv, 201 pp.

傳統與西歐近代之相關性，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最基本的題目。鴉片戰爭以來，西歐在砲艦與資本壓倒性的優勢下，強制地將中國由其本身之秩序中席捲進去，侵蝕了中國傳統性的價值，此價值因而崩潰。從中體西用論開始，到西歐文明有如決隄似地流入與進出，以及傳統思想的後退等，成為清末思想史一貫的系譜。但是此系譜並非一地「進步」下來，列強帝國主義不斷地侵略與舊有統治階層的買辦化，喚起和社會革命不可分割的民族主義運動，舊有統治階層為着試圖強化體制，而推動「近代化」，不久，為二十世紀後半葉帶來世界史上的轉變。

但是社會革命的思想，不容分辯地，如不得不接受西歐近代文明（包含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到

馬克思主義），而與主張包含文化在內之民族認同的民族主義思想結合時，則傳統思想應處何種地位？扮演何種角色？所謂傳統，既然不問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而規定人人之思考與行動，則創出自身的近代，並於變革運動中自覺地取出運作中之傳統性質的因子，在迫切追求亞洲近代的本質上，是最重要的問題。何況以中國過去那樣獨自構築高度文明的民族說來，傳統之力當然更加强運行。本書對傳統與西洋化（反傳統）之間盤根錯節的複雜問題，從正面加以處理，並由此論及現代的意義。

本書的起首說：

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最顯著而且特異的現象之一，是對自己過去的文化遺產出現徹底地否定傳統（iconoclastic）的態度及其持續。在國家與社會的變革，共產主義革命是成功的；然而此新秩序對傳統上歷史、文化遺產的關係，仍是不安定且極不明瞭。共產主義中國的指導人們，對古老中國的傳統，與其以純粹作民族主義的頌揚，不如全力將它根絕。關於這些傳統，他們覺得對今日有威脅，而且對實現有關自己社會主義未來的幻影有障礙。

強調否定傳統——文化革命，是立於為着政治上、社會上的變革，而以精神變革為基本前提的假定上。「人的意識，在遂行革命，形成歷史之上，實具有決定性的角色。」這一信念，用來解明五四時期極端地反傳統主義的特徵，探討今日中國的動向，無疑地猶具重要意義——這是作者研究的動機。

作為這種解明的方法，作者取五四知識分子之指導者陳獨秀、胡適、魯迅三人，由反傳統意識的起源及其性格加以比較，以浮現五四期之傳統否定主義的多樣性與統一性。此三人在性格上、政治上，甚至思想形成過程上，顯然有別，然而有一共通的結論——所謂變革之前提條件為思想革命

，此即堅持必須全面性地廢棄傳統的這種「意識牢結的」(ideological) 結論。

以上先對「導言」簡介，本書是由下列諸項構成：

第二章 五四期有關整體論上的反傳統主義的起源 (I)

第三章 同右 (II)

第四章 陳獨秀的否定傳統的整體論

第五章 胡適的擬似改良主義

第六章 魯迅的複合意識

第七章 結論

以下介紹作者所論之大要，並述其問題所在。

五四期所出現強烈的否定傳統運動，其整體論的性質，不能祇由接受西歐近代思想與進化論之變化的概念來說明。此處所謂的整體論 (totalism)，是將中國傳統視為一有機體。傳統之中，有許多應該否定的事務，決非個別的存在，有的是由某種根源性的因素流出，因此無需對個別的事物一一檢討其價值，祇是一切的傳統，非否定不可。

問題之中心所在，為五四反傳統主義者的這種看法，其實他們所要否定的，就是那種傳統的思考樣式。殷周革命以來，由「天命」信仰所支持的「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 的思想，在天子之下，政治秩序與道德、文化秩序，成為不可分地統合着。漢代陰陽五行學說，為儒家所擷取，形成極為精巧的有機體性的宇宙論，深深地浸透到中國人的思考。擁有如此高度統合性的中華帝國，因辛亥革命，導致王權崩潰，不但政治秩序，連文化秩序也遭到解體。構成傳統內容的諸觀念、諸價值，並非全是當然之理，由變為懷疑與攻擊對象，進而產生全面的傳統否定論。另一方面，傳統的思考樣式，因改變其外形而存續着。袁世凱與張勳之試圖恢復帝制，也是強化反傳統主

義的人們的這種見解。

再者，這些「反傳統主義者明顯可見到的「文化的——主知主義的」(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門徑，也深植於中國的傳統思想。爲使腐朽的中國再生，他們的議論以爲知的、文化的變革較政治、社會、經濟的變革重要。此正是傳統中國的文化特色之一。此處所謂主知主義，是確信思想之力量的態度。人若認識真理，並據以行動，此種「將思想認爲根本的思考樣式」，從孟子以來到朱子學、陽明學、考證學，都是傳統儒教的思考樣式。

活躍於一八九〇年代的中國知識者層 (intelligentsia) 的第一世代(嚴復、康有爲、譚嗣同、梁啟超)，也實行這樣的「文化的、主知主義的」門徑。但是他們仍是生存於傳統的秩序中，並非將傳統所有的形象當做有機性統一體的一部分，因此他們的傳統否定主義並不是整體論的。辛亥革命後，王朝體制崩潰，接着在革命淒慘地挫折的現實中，中國知識者層的第二世代的人們，把這種門徑提高到極限，以至採取主知主義那樣的整體論的思考樣式。一切傳統的諸要素，指所有已腐朽的根本思想與含有有機性關係的事物，因正被病毒侵蝕着。爲使瀕臨滅亡之中國再生，對所有的傳統非進行全面性地否定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不可。而且徹底地、非妥協地五四新文化運動所以展開，是原原本本地踏襲這種傳統的思考樣式而否定傳統，的確爲二十世紀中國帶來「意識的危機」。

陳獨秀所以舉爲五四期知識人的指導者，是因在他們之中含有潛在性的反傳統傾向，而他給與一個明確的形象，可作爲上述文化的——主知主義的門徑、整體論上的反傳統主義的代表。對陳氏而言，儒教是形成中國的傳統本質、整體論上的統一體，因此，其否定亦是全面性的。儒教的部分改革，或者部分的評價等，非爲問題所在，而是「孔教與歐化兩者無並存的餘地」。陳獨秀既然如此徹底地實行攻擊儒教，而其批判却未觸及儒教的哲學面，原因當然是由於儒教之根本思想所衍生

的社會規範（禮教），不適合於現代生活；連其本源也沒批判，則如上所說的不適合，是整體論的觀點，就是這個緣故。

即使常常以改良傳統文化為目標的胡適，仍無擺脫整體論的反傳統主義的窠臼。胡氏的改良主義，不如說是以中國全面歐化為手段的「擬似改良主義」（Pseudoreformism）。杜威的「科學的方法」，所以將自己同化，是由他的主知主義的門徑（此事由他的生涯可見知），進而從中國傳統中尋找出有價值的科學精神，在此基礎上謀求全面性的歐化（祇有如此才能救中國）。

對於此事，魯迅的意識特徵，是在破壞傳統的整體論與對某種傳統價值之信誓間，有深刻的緊張。他在表層意識裏，徹底攻擊傳統中國文化的黑暗與罪惡，然而由於他獨創的筆鋒，其成果顯然超越其他的反傳統主義者。但是在他的深層意識裏，仍被傳統的道德與價值的某種因素深深地浸透著。其例之一是「念舊（愛惜舊有的人間關係）」。這是深植於儒家的世界觀，而一直存續於中國人之心。魯迅畢生所持的全面地傳統否定主義運動與這種深層意識，全無相容的餘地，因而在他的精神底處，引起複雜的衝突。魯迅思想裏面的這種衝突，將二十世紀中國的意識危機，以其獨特的形象反映出來。

以上嘗試作極粗略地簡約，至於其細節之實證部分，完全割愛，所以祇剩下骨架而已。全文一六〇頁，用細字緊湊組合的這本書，包含中國傳統思想與現代思想之具體分析，有需相當耐力閱讀之處，且作者也有其獨特的用語法，即使除開本人的語學能力，恐怕也可稱為難讀之書。以上之簡述，或許有誤讀致生誤解之處。以下就本人所讀，說明其問題所在。

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封建文化徹底反對的運動」，其「全盤歐化」的主張所具有的脆弱性，已經有很多人論及，而且陳獨秀、胡適之中，仍然存續着或可謂為「士大夫意識」的舊思想，也常有人提及。他們所高唱的「民主與科學」、「思想革命」、「文學革命」，在其實質內容方面

，觀念是如何地空疏，由今日視之，已甚為明白。因為他們是那樣地憎惡舊中國，熱望近代化後的中國。他們的思想祇能說是「意締牢結」的一產物，其故何在？理由是傳統上一元論的思考樣式強固地盤結在他們的腦核，而他們的思想是由此析出的關係。這是作者新鮮的問題提出。試圖從現代中國之中，找出傳統的因素，已有許多次，但是它們多取自個別的現象，且與傳統上的因素相結合來解釋的傾向較強，五四知識人也有這種情形，直到今天猶繼續取作思考樣式。這一點，是本書的特色。在無意識之中，採取傳統的思考樣式，進而主張全面地否定傳統，衝擊着五四思想的「不毛性」為克服這樣的思考樣式，作者主張對傳統作「創造的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這才是解決中國在意識上的危機之道。作者的這種主張，是對同時代強烈地關心所致，給予讀者一種魅力的感覺。

但是通讀本書，常常令人注意的，是作者論傳統的場合，幾乎是以儒教為對象，即使在此之外，也限於以士大夫的教養為範圍。我們考慮到現代中國與傳統的問題時，首先想起的事，是「土著」抵抗西歐列強及其所結托的反動勢力，假「近代化」之名，而實施政治、經濟、文化的壓迫，所故國啊！您令人魂牽夢縈！

華振之著

故國神遊

第一集 70 元

第二集 70 元

第三集 70 元

合購 190 元

當史地讀也可，當遊記讀也可，當文學讀也可！

郵撥一九二七四書評書目社

引起的農民革命的傳統。本書的主題，是以五四期的知識人的思想為中心，其界限似以儒教為主要的傳統內容，但若將問題擴大為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史時，則曾洗刷歷史過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啓蒙主義、近代主義的性質，似應放入視野裏。今日有關傳統的問題，若從「人民」之中抽去某種土著的傳統，是不能考慮的。若認為傳統可擴大至此，透過傳統的否定，而再生傳統的問題，並不是單由儒教為中心的所謂「傳統思想」可限定的。創造儒教、道教、彌勒信仰、拜上帝教、降神附體、科學精神等包含一切中國「文化」的根源的力量，如何自由地被解放，似必須加以考慮。作者所論，是關於知識人，其論點愈精密，我對於擴展到其外的世界不得不愈感到不安。

（原評全文刊於「東洋史研究」，第三十八卷第四號，一九八〇年三月）

譯者附識

拙譯稿曾寄給原作者林毓生先生教正，林先生賜覆時略云：

我細看了一遍丸山君的書評，覺得他對拙著的摘要，大致不差。至於最後的批評，正如你所說，並不貼切。蓋拙著所討論的中國傳統是對有意或無意中深受中國儒家傳統之影響的五四領袖人物而言。中國傳統非常深廣，拙著只是談五四激烈反傳統思想的主要成因，並無，也不能，涵蓋整個傳統文化。

林先生認為丸山氏的批評並不貼切。譯者在給林先生的信函是指出丸山氏的批評不中要害。蓋從作者的副題看來，顯然是以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主義為中心來看中國的意識的危機。評者似以求全的態度來評原作者，以至令人有無搔到癢處之感。惟評者指出談中國的傳統，「土著」的存在及其扮演的角色不可忽視，則值得吾人注意。